

上党课也要与时俱进



张 弓

有两位党课达人，媒体上很热。一位是宁波的董国福，博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一位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政教师徐川。两人不在同一城市，也不是一个行业，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上党课上“红”的。董国福上了10年400多堂党课，听过3万多人，他制作的“两学一做”音频放到一个知名电台APP，下载量有5000多次。徐川也绝，10点钟开始的课，9点40分不到，可容纳400人的阶梯教室已经坐满了学生，晚来的只能站在走廊里听。徐川的党课经常是这番“盛况”。

党课是党的教育常修课，有党组织的地方和单位经常举行，但有如此“盛况”的，实属罕见。秘诀在哪呢？从中央和地方媒体对他俩的报道中，我归纳了几条。

首先是放下身段。传统的党课，一般由领导或专家上。他们常以教育者身份出现。这种形式，以前或许可行。因为那时很多党员和

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罪犯信息非常必要

近日，慈溪市检察院牵头法院、公安、司法局，出台《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在其刑满释放后或者假释、缓刑期间，通过各单位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公开其个人信息（6月20日中国广播网）。

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这是司法机关的创新举措，值得肯定。笔者认为，有必要形成更高层次、更加规范的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最大目的在于防范悲剧的再次发生。此项制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诞生于美国。1994年，美国新泽西州7岁女孩梅根·康卡被邻居强奸并杀害，而这个邻居之前实施过两次针对儿童的性侵犯犯罪行为。梅根的妈妈诉，如果自己的女儿知道侵害人有性犯罪的历史，那么她就会有所防备。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梅根法案》，强制所有州制定法律，要求性侵犯假释或刑满出狱后，必须向警方登记住所，并公布社区知悉。该项制度已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推广。

心理学研究表明，性侵儿童者再犯率为各类犯罪之首。我国也有多起性侵儿童案施害者有犯罪前科。此外，犯罪主体多为邻居、教师等未成年人熟悉的人。如果不对此类信息曝光，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很可能意识不到潜伏在身边的危险，进而导致悲剧发生。虽然有观点认为，犯罪分子服刑完毕后就应当享有普通人应有的权利，过度曝光其个人信息，既不利于其融入社会，又可能侵犯其名誉权。但权利总是相对的，有边界的，相对于未成年人的自身安全，性侵未成年人这种极端恶性犯罪者，有必要在出狱后继续承担包括信息公开的义务。

我国早有公开犯罪者相关信息的做法。各地法院均推行了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向社会公开裁判文书的有关内容。公开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者的信息，其实是在裁判文书公开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有关信息，并加工、归类、整合后形成的特殊的信息公开。

作为社会的未来，未成年人的权利不能被虚置，保护未成年人更不能成为空谈。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以更完善的制度，约束有性侵未成年人前科的人员，让未成年人远离潜伏在身边的威胁。（史洪举）

入党积极分子文化程度低，信息渠道少，对于党的知识，或者看不懂，或者无法透彻理解，需要开大课讲授。现在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大多是年轻人，其中不少是大学生，又因为互联网兴起，获取信息的渠道史无前例地广阔，所以他们见多识广，自我意识强，再居高临下地教导，他们会抗拒、逆反。上述两位党课达人注意到了受众的这些特点，所以能放下身段，与大家平等交流。他们与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多是“圈内”朋友，随便聊，随时谈，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学生在微信公众号里向徐川提过“怎么排解没有对象的空虚”“是金子总会发光，我是银子怎么办”这类问题，他也一一认真回答。董国福有个三不讲：大话不讲，空话不讲，自己不相信的不讲，还坚持不糊着脸说话。因为绷着脸说空话、大话，最令人生厌。

同时要敢于发声。既然是党课，自然要坚持把党的宗旨、原则、纪律讲给大家听，而不是毫无目的地闲聊。毋庸讳言，我们在较长时间忽视了党的教育，社会上又存在一些对党的认识误区，如信仰缺失、宗旨观念淡薄等现象，在党内很普遍。面对现实，党课讲授者就一定要敢于发出正确的声音，说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徐

川和董国福讲党课，都敢于宣扬宗旨，鼓励正义，遇到问题时，用理论与事实同听众开诚布公地讨论，不藏着掖着。徐川在回答学生的提问中，不仅勇于亮出自己的观点，还在个人公众号里发表了50多篇旗帜鲜明又有说服力的文章，其中既有《寒假，不妨用心做好一件事》《我依然坚信这个世界的美好》等系列，也有《青年节里谈中国》《国庆节里谈爱国》等节日谈，并不断向学生传授看问题的视角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事实还证明，上党课的平台创新很关键。年轻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又喜欢碎片化阅读，所以很厚的学习资料，上几个小时的大课，不受欢迎。有些单位为了保证党课的秩序，采取点名、打卡、扣钱等办法，看上去秩序好多了，但实际效果差强人意。不是因为年轻人自由散漫，而是教育的形式太过陈旧。

董国福今年2月在网上发起的调查显示，96%的人愿意“听”党课，过半的受访者建议每堂课控制在10分钟左右。于是他在“喜马拉雅”建了个“国福频道”，把已经录好的20期“两学一做”党课音频放上去，每集8分钟至10分钟，全国观众追着听。徐川每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接到学生的提问少则数十个，多则近百个。

多一次，他收到了500个问题。这种需求与供给“无缝对接”的“碎片化党课”，大受欢迎。

上课时把自己摆进去，说服力会大增。讲自己的认识过程、亲身经历，将大道理融入小故事中去，才能让人感动、信服。董国福上党课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没有大道理给你讲，但有小故事跟你讲。”

把大道理融入小故事，比光讲大道理难一百倍。有同学问，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川为此讲了自己申请入党的过程。大学里读书时，他各方面表现都好，就是成绩不好，所以不敢申请。以后是院党委书记做的一件小事，让他下了决心。在讨论保送读研的名单时，这位书记没送成绩一直前三的亲侄女，而是报了另一个学生。就此事询问书记时，他的解释是：当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党员本来就要作出牺牲和让步，不然凭什么你是党员。听着这样的故事，别说不懂世事的年轻人对共产党的敬仰之情会油然而生，就是老党员，也会倍感怀念和钦佩。

两位党课工作者的成功再次证明：不是年轻人不愿意接受教育，而是我们的教育方式不适合他们。时代在发展，与时俱进地上好党课，永远是党内教育需要面对的大课题。

画里话外



据6月19日《华商报》报道：程姑娘今年23岁，安徽阜阳人，跟家人一直在浙江台州打工。近日，她接到一个电话，称她在此前参加过的一个活动中中了10万元大奖。她与家人不信，拒绝前去领奖。后在当地媒体及派出所帮助下，证实中奖属实，才决定去领奖。

中奖领奖挺寻常，第一反应怕上当。缘何人人多心眼，信任缺失是根源。

社会有法有规章，好事临头不慌张。打击诈骗靠平时，共筑互信安全墙。

朱晨凯 文 何青云 绘

警惕“打员工屁股”背后的羞辱常态化

毕 桐

19日晚，网友发布一段山西长治漳泽农商银行通过当众打员工屁股，进行绩效考核的视频。视频中，一名中年男子手持木槌，当众打了8名员工的屁股，包括4名女性员工。银行工作人员说，这是企业内部培训的玩游戏环节，打人者不是公司领导层，是培训老师。

无论是不是公司领导层，也不管是不是内部培训，当众打员工屁股，本质上就是人格羞辱。文明社会，即使对违法犯罪者，不得实施社会羞辱也是常识。甚至，在多大程度接受和容忍羞辱已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水准的天然尺度之一。

当下的中国，各类羞辱事件

虽时有发生，但公共舆论对社会羞辱事件的讨伐和反思也基本保持同步。无论是来自公共权力的羞辱，还是来自私权力的羞辱，都为有识之士批判的对象。毫无疑问，有了社会批判的持续发力，才能生成公民的道义观，也才能阻遏社会羞辱的蔓延。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社会羞辱行为是后天习得行为，和诸多社会行为相比，有很大的社会遗传基因。比如，在一些公共机构中，某个执法人员羞辱公民，认为公民就是低他一等，这种心理就在于其特权意识；而在企业中，管理人员对普通员工抱有等级观，认为员工应是无意识服从的奴仆，必须绝对服从管理者的指令，哪怕是无理的，也是当下劳资博弈中劳动者处于弱势的现实写照；甚至在学校，某些教师羞辱学生，不把学生人格当回事，也是对教育权的滥用。

糟糕的情况是，羞辱他人成为一种习惯，乃至被不少人认同并遵从。投射与认同，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心理互动机制。当一个地位高的人去羞辱另一个人时，这个人接受羞辱而不反抗，这种投射性认同很容易把羞辱习惯传递到他人身上，甚至沿袭到下一代，最终造成羞辱的社会和代际传递。

在《正派社会》一书中，作者马格利特指出，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不是不做哪一些事，而是不做哪一种事。在我看来，羞辱他人，就是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不羞辱社会成员，不羞辱比自己看似更弱小的他人，这就是我们社会要为之不断努力的。

子、水管子的安全。如果还未意识到垃圾“上山下乡”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这种鼠目寸光的行为，将断送城市和乡村健康发展的明天。

垃圾治理贵在守土有责、持之以恒。10部门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已明确责任分工。因而，各部门就应当进一步拿出切实际行动，既要监管好城市垃圾运输、处理全过程，以无害化处理为底线，推进垃圾分类、掌握变废为宝本领，扶持资源化处理企业、缓解财政压力；又要逐步建立针对农村垃圾的长效治理机制，防止走过场、“一阵风”；更要确保取得实效、不留死角，杜绝形象工程、表面文章，让监管的乏力、责任的漠视不再上演。

垃圾出城，莫让乡愁变“乡臭”



新华社记者 魏圣曜 高健钧

近日有媒体报道，陕西一些城市垃圾被运出城外，在乡村周边堆砌成山、污染环境。去年11月，国家10部门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发言犹在耳，垃圾“上山下乡”却再次抬头。对此，有关部门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切实保障农村人居环境，莫让乡愁变成承载垃圾的“乡臭”。

据住建部测算，我国农村地区常住人口产生的生活垃圾一年约有1.1亿吨，其中有0.7亿吨

未作任何处理。如今，来不及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也大量向农村、郊区流动，在一些村落周边堆砌成山，只能处于“一靠风刮，二靠蒸发”的局面，严重影响农民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

运出城后的垃圾本应得到妥善处理，却演变成“上山下乡”“垃圾围村”，折射出在城市垃圾运输处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等环节依然有不少盲点。管理者漠视责任、垃圾处理简单粗放等因素，导致垃圾“上山下乡”在一些地区反复发生，迟迟难以根治。

离开农村的城市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污染乡村就是在污染城市。已经出城围村的垃圾，也许不会在城市中产生异味、刺激感官，但时刻牵动着菜篮子、米袋

子、水管子的安全。如果还未意识到垃圾“上山下乡”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这种鼠目寸光的行为，将断送城市和乡村健康发展的明天。

垃圾治理贵在守土有责、持之以恒。10部门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已明确责任分工。因而，各部门就应当进一步拿出切实际行动，既要监管好城市垃圾运输、处理全过程，以无害化处理为底线，推进垃圾分类、掌握变废为宝本领，扶持资源化处理企业、缓解财政压力；又要逐步建立针对农村垃圾的长效治理机制，防止走过场、“一阵风”；更要确保取得实效、不留死角，杜绝形象工程、表面文章，让监管的乏力、责任的漠视不再上演。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期待高考早日不用防作弊

何良京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过去了。今年高考除屏蔽手机信号外，有些学校还首次使用人脸识别、指纹鉴定和监控系统等技术防止作弊。同时，教育部门还在运输试卷的车辆上安装定位系统。这些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加上“作弊入刑”等规定，使得今年高考有了“史上最严”的称号。

纵观古今，从历史上的科举取士到今天考大学，作弊问题一直存在。作弊与反作弊，攻防共生。虽然我们期盼“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但这魔从来就没有退出过江湖，反而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技术发展，作弊手段更加多样化。作弊虽是极少数人所为，但损害公平，影响甚大，为何屡禁不绝呢？

高考“作弊入刑”，有人叫好，也有人担心过于严厉，会毁掉作弊考生的人生。但我们就不想想，作弊完全是当事者的主观行为，他不违法，再重的法律大棒也打不到他呀！所以，笔者认为，不是“作弊入刑”太重了，而是以前处罚得太轻了。以至作弊者心存侥幸；即使被发现查处，损失也不大。换句话说，违法成本太低，变相鼓励了个人铤而走险。更让人奇怪的是，什么针孔摄像头阅卷、遥控解题、短信息传递答案等手段，居然成了产业，在网上公然叫卖。这种事怎么就查不了，任其泛滥呢？监管的松弛，也给作弊开了口子。

当然，高考作弊最原始的“动力”还是人们太看重高考了。考生、家长、老师、学校甚至一

个地方，均有各自利益维系在这一考中。考好了，考生能上一所好学校，前途一片光明，家长脸上有光，学校也争来了知名度、无形资产，地方形象也会有所提升……于是乎，考生乃至相关人员无不竭尽全力，少数人甚至不择手段。

其实，高考无非是一次对考生掌握相关知识的检测而已，异化到现在这种状况，跟高校普遍存在的“严进宽出”现象不无关系。因为一旦考上大学就等于进了保险箱，进去混张文凭出来不是什么难事，许多考生就把高考定为人生最大一搏。于是，那些在初中、高中不努力的考生，难免有个别人在走正道无望的情况下，去“赌一把”。如果我们的高校是“宽进严出”，哪怕通过非常手段进了学校，混了三年五载仍无法拿到文凭，“南郭先生”们还会来浪费时间吗？因此可以改革一下，让考生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去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譬如，考生可以填报多所学校，可以被多所学校同时录取，然后自己选择。

当下，我们正在推进诚信建设，应该对学生们特别强调，诚信乃立身之本。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落实管理措施，让考生不敢作弊、不能作弊乃至不用作弊；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加强诚信教育，让考生有自觉的道德约束，做到不想作弊，哪怕是正确答案唾手可得。

做君子还是做小人，往往一念之差。人生在世，谁不想当君子呢？但能不能成为君子，固然跟社会环境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在面临人生选择时，能够坦坦荡荡，问心无愧，切不可触犯法律。

热点@微评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6月20日央广网报道：全国已有近20个城市上线了地方性叫车平台，共同点是官方色彩浓厚——政府搭台，出租车企业唱戏，天生具备“合法性”，国资成为主力军，投入不菲。就市场反响来看，其中半数已是停滞状态。

点评：“根红苗正”是地方性叫车平台的优势，但技术滞后，服务意识匮乏，使得优势没能转化为生产力，难以得到乘客认可。这再次证明，非特殊领域，就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贸然出手，往往是自寻尴尬和烦恼。

@小芳和老狼：进一步让人看到，市场力量的不可逆。

@WEEW若若：谁来承担决策上的责任？又是否应给公众一个周全的答复？



据6月20日澎湃新闻报道：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后，不文明现象仍有发生，例如有男孩在草丛中大便。有游客表示，游乐项目的排队区域没有厕所，小孩倘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在公共场所“方便”也情有可原。

点评：谁没有羞耻之心？谁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小便？但“人有三急”，被逼无奈往往只好撕下脸面。这么重要的场所居然没有厕所，服务水平叫人质疑。

@甜甜甜：对不文明行为的辩解才是不文明现象的本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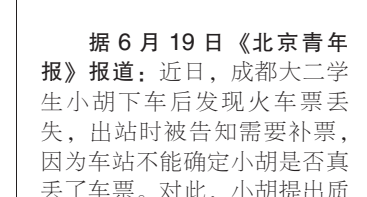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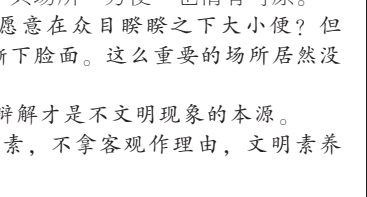
@小P卖珠宝：强调主观因素，不拿客观作理由，文明素养才能得到提升。

据6月19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成都大二学生小胡下车后发现火车票丢失，出站时被告知需要补票，因为车站不能确定小胡是否真丢了车票。对此，小胡提出质疑。此事再次引发关于“实名制火车票丢失后如何补票”问题的热议。

点评：实名制最大特点就是“一一对应”，谁在哪里上车、下车一目了然，只要车站工作人员到位，“实名制”的车票不应该也不会被冒用。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了，应该有一个让公众能够接受的处理办法，而不是每次这样打“口水仗”。

@牛9通吃你：实名制下，这样的硬性规定，就更加让人觉得不合理了。

@不眠夜数羊到天明：“下车后丢票只能补票出站”的死板规定，有点霸王条款哦。



据6月19日《华商报》报道：近日，陕西延长县的陈先生遇到一件奇葩事，他给儿子寄的邮件本来3天应该到达，结果“舍近求远”花了13天。该邮件的始发地为延川县四家河邮政所，目的地为呼伦贝尔牙克石投递局。按说邮件一路北上即可到达目的地，而该邮件在运送期间，折返西安、中转成都、乌鲁木齐，经过10站，绕了一圈才最终抵达目的地。

点评：都是快递，差距咋这么大呢？根源或许在于以前吃惯了“大锅饭”，现在还没回过神来。物流现在是竞争最为充分的行业之一，这样的管理与服务水平真叫人担忧。

@晓明：说明投递安排和质量肯定出了问题。

@技术师傅周晴晴：回应可能不能“锅速”。

据6月19日《华商报》报道：近日，陕西延长县的陈先生遇到一件奇葩事，他给儿子寄的邮件本来3天应该到达，结果“舍近求远”花了13天。该邮件的始发地为延川县四家河邮政所，目的地为呼伦贝尔牙克石投递局。按说邮件一路北上即可到达目的地，而该邮件在运送期间，折返西安、中转成都、乌鲁木齐，经过10站，绕了一圈才最终抵达目的地。

点评：都是快递，差距咋这么大呢？根源或许在于以前吃惯了“大锅饭”，现在还没回过神来。物流现在是竞争最为充分的行业之一，这样的管理与服务水平真叫人担忧。

@晓明：说明投递安排和质量肯定出了问题。

@技术师傅周晴晴：回应可能不能“锅速”。